中央政策組合拳 精準賦能香港金融中心建設

卓銘 新聞背後

為支持香港發展固定收益及貨幣市場、構建全球領先離岸人民幣市場，中央日前出台11項新措施，持續深化香港和內地金融市場聯動合作，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綜觀這一套政策組合拳，針對性強、戰略前瞻性突出，覆蓋兩地互聯互通升級、市場流動性增強、跨境金融產品創新多維度，形成系統完備的政策體系，對香港金融市場高質量發展意義深遠**。在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的當下，中央惠港措施及時而至，香港須把握機遇，用好政策紅利，立足自身獨特優勢，主動服務國家戰略發展所需。

11項新措施分別圍繞深化互聯互通與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既有着重短期成效的擴容優化，亦有放眼長遠的制度與平台建設。對香港而言，其重大利好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鞏固香港跨境資本超級橋樑角色。優化「債券通」北向通、南向通，以及「互換通」等安排，雖然看似只是細節上的調整，但增加投資淨額度、引入回購定盤利率、相關債券產品輻射澳門債券市場等等，都是實打實地提升香港作為固定收益市場的吸引力與效率。新措施一方面為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國際債券配置渠道，滿足其資產多元配備需求；另一方面，則大幅提升境外投資者參與便利性與資金使用效率，配合港交所即將推出的五年期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意味香港將有更多風險管理新工具，有助強化香港的全球資本配置轉變中的樞紐功能。

數據顯示，去年光是「債券通」北向通的交易量便接近10萬億元人民幣，截至今年5月，外資持有中國債券規模高達3萬億元人民幣，而國際投資者逾七成A股持倉及約三分二內地債券持倉，都是經香港渠道取得，充分說明香港作為中外金融樞紐的優勢將進一步放大，強化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國際資本的橋樑角色。

第二，拓深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豐富產品體系。香港長期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如何提升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深度與廣度，是香港金融業界不得不回應的大命題。新措施擴容優化了金管局人民幣業務的資金安排，結合流動資金投標機制、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雙邊貨幣交易框架等措施，都是旨在豐富金融產品選擇，提升人民幣國際貨幣功能。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已具規模優勢，點心債發行連續兩年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存量逾1.6萬億元，但現在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卻僅佔約4%、央行儲備約2%，仍有巨大擴展空間。進一步擴大資金額度，相當於讓實體經濟投融資得到更好支撐；而正在研究中的投標機制和短期債務工具，則有助完善利率曲線，降低交易成本；與印尼盾雙邊框架，亦有助拓展區域影響力，為未來「一帶一路」及RCEP合作打通更多渠道。從長遠看，香港鞏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也是推動國際金融市場構建一個更多元互補的體系，其中香港則作為風險管理中心，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功能。

第三，升級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完善全產業生態。香港金融市場最大的價值，在於其開放平台與連接內地市場機遇的能力，隨着內地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未來兩地的金融體系將是一個多元互通的網絡。因此新措施透過一級發行、二級流動性、離岸業務及新一代金融基建，可視為在全球投資者公開一張契合固定收益及貨幣市場發展的路線圖。

如今內地企業進入以產業鏈全球布局為特徵的「出海3.0」時代，香港金融中心的角色更為重要。尤其對正在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的香港而言，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發展等戰略項目，都離不開金融這個核心支柱。新措施為兩地互聯互通、人民幣國際化、風險管理等方面制定了量化目標與路徑，也就讓香港更好籌劃如何強化產業鏈「出海」平台，提供全球貿易融資、資金管理等專業服務，配合國家高水平開放的過程更上層樓。

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這次中央公布的11項措施，無疑是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堅定支持與戰略加持，站在香港角度，這更是重要的政策背書與實施抓手，各界更要把握機遇，把政策紅利轉變為實實在在的發展優勢，為國家高水平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貢獻更大力量**。這不僅是一次香港金融市場的升級，也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步。

背靠祖國天地寬 服務大局正當時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

鄭翔玲 議事論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一重要表述，既是中央對香港的關懷與支持，更是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殷切期許。**「十五五」開局之年，香港即將迎來首個五年規劃。這將是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躍升，更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從理念走向實踐的歷史性一步。站在由治及興的新起點上，我們應凝聚社會共識、落實使命擔當，把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當作奮鬥的全新動力，譜寫香港新篇章**。

從參與者到貢獻者的轉變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中央政府堅定支持下，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回首過去幾年，香港走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歷程。從黑暴肆虐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從選舉亂象到「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香港的政治生態完成根本性重塑。尤其在本屆政府任期內，香港經濟實現了從負增長到穩步復甦的轉變——2025年全年經濟增長3.5%，2026年第一季度增幅更達5.9%，遠超市場預期；公屋輪候時間由6.1年縮短至4.7年；香港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躍升至第二位，創七年新高；超過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這些沉甸甸的「成績單」有力證明：告別內耗、聚焦發展，香港完全有能力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實現更好發展。也讓各界看到，這些成績的背後，離不開國家戰略的托舉，背靠祖國，是香港發展的最大倚仗。

隨着「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香港肩負着發展自身和貢獻國家的雙重使命。從「十四五」到「十五五」，國家對香港的定位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變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多了「服務」兩個字，意味着更大的責任，意味着我們要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主動作為的坐標。香港將從國家發展的「參與者」邁向更加積極的「服務者」和「貢獻者」。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除了抓住國家機遇，其實也是對接全球機遇。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說，國家的五年規劃是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審時度勢制定的，擁有「一國兩制」優勢的香港，完全可以借助國家戰略布局拓展國際發展空間。

「十五五」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承前啟後的關鍵五年，也是香港鞏固由治及興成果、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轉型升級的窗口期。當前香港首要大事，就是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全力推進編制首個五年規劃。

過去香港人習慣「跟着市場走」，總覺得規劃是計劃經濟的事。但這一次，從特區政府到社會各界，都高度認同一個道理：沒有規劃的繁榮是盲目的繁榮，沒有遠見的城市終將被時代拋下。首個五年規劃，標誌着香港治理進入了一個新境界——政府主動作為、社會廣泛參與、目標清晰可期。特別是北部都會區、創科走廊、公營房屋等硬指標，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無數家庭改善居住條件的希望，是年輕人創業就業的舞台。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也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然選擇。融入和服務，是空間上的對標。北部都會區是香港對接國家戰略的最前線——全面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承載產業集聚、人才聚居、跨境合作多重功能，有望徹底破解香港土地不足、產業空間匱乏的核心短板。是產業上的對標——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香港主動對接，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布局人工智能、生物科研等領域，財政預算專門安排100億專項資金。河套香港園區從「規劃圖」變成了「實景圖」，首期三座大樓已落成，有超過70家公司入駐，入駐率接近九成。更是治理上的對標——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社會各界建言獻策——香港治理正在從「積極不干預」走向「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相結合」。

「服務」二字，更在於香港能為國家貢獻什麼。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國際化的專業服務，可以深度嵌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香港的大學基礎研究全球領先，通過河套合作區打通「從0到1」的基礎研發和「從1到N」的產業落地全鏈條；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是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樑。

獲源源不斷新空間新動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這個重要論斷把香港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對國家貢獻越大，香港發展就越好，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被歷史反覆驗證的真理。回望過去，每一次香港的跨越式發展，都離不開國家的戰略支撐；展望未來，香港只有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新空間、新動能**。

站在新起點上，行政長官李家超部署香港將全力做好三方面工作：全速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進一步改善民生。我們將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配合首個五年規劃落地，深耕經濟發展、地區治理與民生改善，守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實現從「融入大局」向「融入和服務大局」的升級。

背靠祖國天地寬，服務大局正當時。讓我們與國家同心、同向、同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書寫屬於香港的精彩篇章！

香港中華聯誼會會長

霍爾木茲海峽陷入「脆弱新常態」

軒轅靖 國際觀察

當地時間7月8日凌晨，美軍對伊朗沿海目標發起新一輪打擊，擊中超過80個目標，美方聲稱行動是回應伊朗襲擊三艘穿行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美財政部同時宣布撤銷對伊朗石油生產、交付和銷售的60天授權。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強烈譴責美國嚴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伊朗武裝部隊強調，將對美方襲擊作出堅決回應，重申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美國干涉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

美伊上月達成60天臨時停火協議後，美軍先後4次以商船被襲為由，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關鍵是，美軍發動多次軍事打擊的同時，一直強調「停火協議有效」。伊朗軍方雖然宣稱對美進行堅決回應，但並未承認對襲擊商船負責。雙方都在拉鋸試探，卻不願徹底撕毀協議，在打打停停中讓市場更焦慮也更煎熬，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已陷入「襲擊、報復、再襲擊、再報復」不斷循環的「脆弱新常態」。

當前，霍爾木茲海峽北部由伊朗控制，中部是傳統國際航道，南部由阿曼、美國和國際海事組織協調運行。商船必須在三條航線之間作出選擇，而無論選擇哪一條，都存在風險。北部航線被伊朗視為「合規」但被美國視為「妥協」，南部航線有美軍護航但可能招致伊朗的無人機攻擊。伊朗宣稱，擅自駛離指定航線的船舶將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關保險保障。

正因如此，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保險費用至今仍是正常水平的20倍。截至6月底，海峽日均通航量僅恢復至衝突前約57%；空載駛入波斯灣的油輪數量依舊處於歷史偏低水平。因為沒有人願意把船開進一個隨時可能變成戰場的水道。這種成本不會隨着某次停火而消失，只會伴隨着美伊之間的打打停停造成市場焦慮，推升運輸成本。

這種「脆弱新常態」還在於規則本身的懸而未決。伊朗堅持60天過渡期結束後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收取「服務費」，據估計每年可帶來400億美元收入。美國則堅持伊朗無權單方面改變海峽的法理狀態。阿曼提出了參照馬六甲海峽模式的通行收費機制方案，但伊朗對自願繳費還是強制收費仍存在分歧。

伊朗武裝部隊堅持認為，由伊朗設定的通航線路是油輪和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唯一安全航線。這意味着伊朗不僅要在物理上控制海峽，更要在法理上確立對海峽的管理權。美國顯然不會接受，這也意味着，即使美伊達成最終和平協議，霍爾木茲海峽通行也將留下「收費」後遺症。

這種脆弱而危險的新常態，更為全球油價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布倫特原油在美伊停火後曾回落至71.99美元，昨日空襲後又跳漲至76.6美元。由於美伊之間沒有信任，只有臨時性的利益計算，導致全球市場只能把每一桶原油的價格都加上風險溢價。因為霍爾木茲海峽「脆弱新常態」終究不是常態，而是處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灰色地帶，這種灰色地帶恰恰是最危險的。因為它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只會導致打打停停的焦灼狀態。

國際關係學者

中國如何應對歐洲當下的挑戰?

宋魯鄭 看大勢

2026年世界日益動盪。俄烏衝突依然持續，一向秉持美國優先、不捲入外部衝突的特朗普突然一再對外動武，尤其是對伊戰爭嚴重衝擊全球政治經濟穩定：油價猛漲、通脹大幅上升，歐洲拒絕支持美國而導致大西洋關係更加惡化。

放眼世界，中國是唯一保持和提供穩定性、確定性的國家。特別是美伊戰爭期間，中國對防止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做出過巨大貢獻：作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中國在戰爭期間卻大幅減少了石油進口，同比下降40%，從而令全球油價沒有失控。法國《費加羅報》為此發表文章：《中國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經濟》，提出正是由於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儲備緩衝了石油衝擊，從而令能源業界人士預測的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一桶的災難性場面得以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道義還是從自身利益角度，歐洲都應該積極改善和中國的關係並進而攜手合作應對當前的挑戰和危機。但事實卻是歐洲從多個方面主動向中國發難：

1月提出《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限定成員國在36個月內更換移動網絡的中國產品，特別是系統性的市場排除從電信領域擴大到電力、自動駕駛、雲服務等十八個行業。3月公布《工業加速器法案》提案，對中國遙遙領先的電池、電動汽車、光伏、關鍵原材料四大領域設置限制。4月對俄羅斯的第20輪制裁中，將6家中國公司列入清單，6月又增加了4家中國企業。5月，歐盟依據《外國補貼條例》以對京東收購案啟動調查為標誌，對中國的行動大幅升級，並首度引發中國報復。與此同時，歐洲還宣布大型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場不能再使用中國生產的逆變器。6月歐盟峰會期間，德國總理默茨提出要效仿當年歐美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的方式對待中國。這個協議導致日本經濟停滯三十年。7月1日還有兩項政策正式執行：對中國鋼鐵免稅配額削減幾乎一半、超額關稅直接翻倍至50%；取消150歐元以下商品的免稅政策統一徵收3歐元，此類產品中國佔90%以上。

歐盟面臨美俄挑戰和世界亂局卻對中國打出組合拳，意欲何為？中國如何應對？這可以從四個層面解讀。

首先，中歐的衝突是戰略層面的，而不是經貿問題。

在歐盟看來，俄羅斯經濟實力弱小，沒有一個成功有吸引力的政治經濟模式，依舊是傳統的政治強人加出口資源組合。至於美國仍然是西方和盟友的定性沒有改變。只有中國既有成功的發展道路，也不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歐盟把中國當作唯一的制度性對手，是真正的威脅。它是從這個角度、以經濟為手段對中國發起的攻擊。實質是安全和政治高度的攻擊：要麼和中國脫鉤，要麼遏制中國競爭能力和發展。這決定了雙方衝突的性質是零和博弈。這不是正常的談判、妥協、讓步所能解決的。中國為此有清醒的認識。當然歐盟和美國還是有所區別，歐盟捍衛的是西方主導地位，有更多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捍衛的只是自己的霸權，有很強的功利性。

其次，今天中國面臨的外部最大挑戰是美國。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既有實力也有強烈主觀意願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國家。它不僅綜合國力遠高於歐盟，而且有更強的執行力和效率。特別是由實力和傳統構成的對整個西方的號召力是歐盟所不具備的。所以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美國是主要矛盾，歐洲是次要矛盾。對美國中國毫無幻想，以戰略對抗達成戰略談判進而達至戰略相持、穩定。但對歐洲則戰略懷柔和忍讓。畢竟中歐直接對抗很大程度會分散中國的力量，美國直接得利，同時還會強化歐美合作：或者民主黨執政雙方合作更加密切，或者特朗普時期給雙方改善關係提供契機。

第三，歐洲內部的政治分裂日益突出，這主要體現在極右政治勢力和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

今年是英國脫歐十周年，這是歐洲民粹主義借助體制一次成功的力量展示，給了高歌猛進的歐盟一體化一記重挫，造成空前巨大的損害。現在另一個不亞於英國脫歐的政治危機正在臨近：2027年上半年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根據目前的民調，排外和反歐盟的極右政黨領袖有望歷史性入主愛麗舍宮。另外一個有可能進入第二輪的極左翼領導人梅朗雄則表示，如果極右上台，他領導的力量將在議會和街頭開展最激烈的全面抗衡。這場選舉不僅引爆法國內部衝突，也直接危及歐盟的存廢。此時歐盟將很難再顧及中國。

第四，歐盟同時和中美俄對立，難言利益理性。

民族國家和由此產生的外交現實主義誕生於歐洲，法國作為天主教國家，歷史上不僅聯合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也聯合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對抗，國家理性超越神聖的宗教信仰。但今天的歐洲則是政治信仰超越一切。從而出現了極其罕見的和全球所有大國對抗的地緣政治之舉。面對沒有利益理性的歐洲，無論對抗還是談判都沒有多大意義：它既不在乎損失，也不在乎收益。

以上四個層次決定了中國對歐洲的四大應對方式：一是不主動、不升級、不纏鬥。二是以歐洲最需要中國的領域進行有限報復，既要打痛它，還要把自身成本降到最低。這包括關鍵原材料（含藥物原料）、清潔技術和新能源產業鏈、關鍵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三是耐心等待歐洲內部政局變化和自亂。四是強化中俄戰略協作關係、確保當下的中美戰略穩定，從而令俄美都能放手和歐洲對抗，使歐洲對華遏制力量減弱。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